

自贸区研究系列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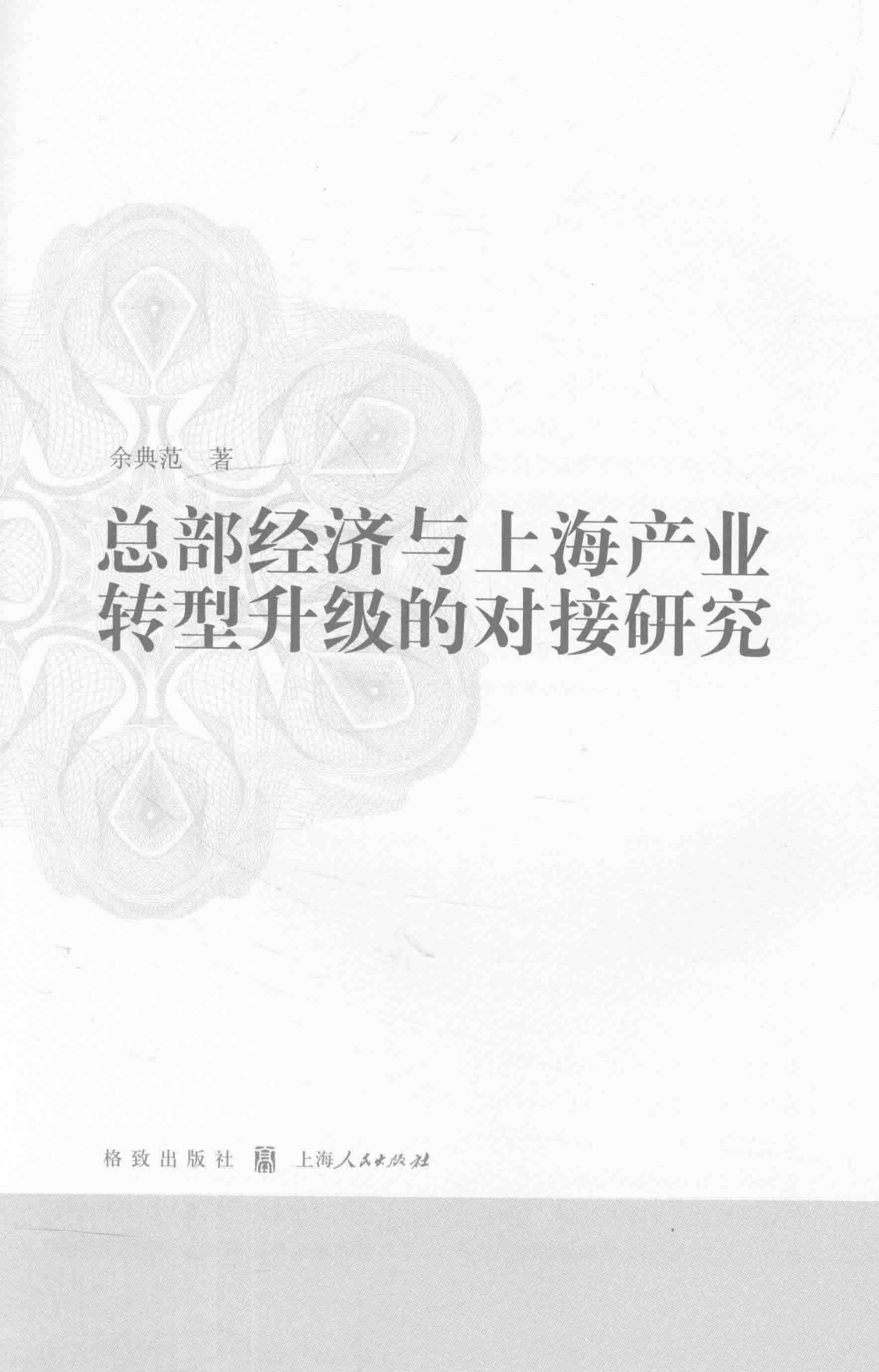
余典范 著

总部经济与上海产业 转型升级的对接研究

经济升级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余典范 著

总部经济与上海产业 转型升级的对接研究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部经济与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对接研究/余典范
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自贸区研究系列)
ISBN 978-7-5432-2540-4
I. ①总… II. ①余… III. ①企业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上海市 IV. ①F27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7363 号

责任编辑 程 倩
装帧设计 路 静

自贸区研究系列

总部经济与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对接研究

余典范 著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223,000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540-4/F·861

定价:42.00 元

前 言

上海的资源特点与城市功能决定了上海今后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价值链为导向的产业高端化发展思路,在重点产业与高端价值链环节中加以重点突破。而总部经济具有的集聚经济、高端经济、创新经济、集约经济、合作经济等特征符合中心城市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内在要求,总部经济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所产生与衍生的行业正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产业转型的方向。近年来,上海总部经济快速发展,总体发展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有效促进了产业转型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尽管上海总部经济对上海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二者的融合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第一,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在内涵上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协调。目前上海的企业总部主要在传统制造业布局较广,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方面的企业总部发展还比较缓慢,这不仅与总部经济的发展趋势不一致,而且与上海的产业转型也不符。第二,上海总部经济的“根植性”较差、与产业的契合度不高。外资企业总部以及研发中心与上海本土企业的合作总体上并不紧密,二者的互动比较少。不论是在所从事的研发内容还是在组织形式上,外资研发中心与上海本土企业的交集都比较少,对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还相当有限。特别是在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化等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的重点方向上,外资企业在此方面的参与度与贡献度还比较少。第三,目前上海引进与发展的企业总部的级别较低,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能力较弱,而且这些总部往往是直接为母公司或者海外市场服务的,对上海产业资源的整合能力还有所欠缺。第四,本土总部企业的发展滞后限制了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与活力。从根本上来看,总部经济与产业的发展还有赖于本土总部企业的发展,这样的经济形态才有可持续性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上海应在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的同时积极培育本土总部企业的发

展,特别是对需要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的新兴产业更应如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扶持那些在新兴产业中有成长潜力的企业,使其成为发展总部经济的生力军。

因此,本书认为总部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的升级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如果单纯追求总部企业的落地,而不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统筹总部经济的发展,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将会大打折扣。因此,一方面上海应完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总部企业入驻;另一方面上海应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积极促进总部经济与上海产业发展的融合,不仅让企业总部落地,更重要的是推进总部经济在上海“生根”,构建富有竞争力的总部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

具体来看,上海应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完善与加强:

一是适应上海向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企业总部的认定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标准,实施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增强上海总部经济对优质服务企业的集聚。在当前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总部企业的引进不能完全以注册资本以及投资额来衡量。在一些企业总部的认定上,需要改变以前一刀切的做法,从过去单纯以注册资金、销售额等规模性指标为标准,转化为以功能性指标为标准。同时,应将对跨国公司总部的优惠政策适当向国内优势企业总部扩散。把优势企业的认定权利进一步下放到区县政府,充分调动区县推动优势企业发展的积极性,适当放宽对服务型、管理型、经济型、研发型企业总部的认定标准。做好主要的关键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工作,形成发展企业总部经济的良好格局。对一些支柱产业以及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的企业总部,由于其对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起着关键的作用,因而在其来上海后的若干年,要一直能对它们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或者增加折旧费等各种优惠的政策,一方面奖励它们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吸引它们继续投资。

二是加大力度吸引更高级别的总部企业,增强对产业资源的整合能力,充分带动上海产业价值链的升级,形成良好的总部经济生态体系。上海在发展总部经济的选择上应该做到有的放矢、集中资源,积极吸引总部经济中具有控制中枢功能的企业与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工作机制,积极促进总部经济与上海产业的互动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生态体系。一方面,加强产业集聚区的网络建设,形成合理的产业协同网络。各区县应积极搭建总部企业与所在地相关企业合作的平台以及共性服务平台等,增加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对总部企业与本土企业的

合作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加强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交流,实现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对于外资研发中心,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其与本土企业、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研究中心、培训中心、技术联盟等组织机构,积极支持本土企业成为高水平总部企业的供应商或服务商,提升总部经济的溢出效应。

三是创新政策体系与服务机制,降低总部企业的商务成本,构建总部—制造基地的合理布局。优势企业总部与一般企业的需求明显不同,一般的雷同优惠政策和税收优惠已经很难打动它们,上海希望优势企业能够落户本市或继续在本市发展,就需要根据各类优势企业的发展需求进行重点跟踪,并制定一些与之相应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许多企业都有将总部与制造基地分离的诉求,然而制造基地和总部基地的分离,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交流和协作成本。因此,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产业的集聚和上下游的关联,另一方面要改善商务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即要从交通、物流、信息、政府效率、信用、合约执行、融资和税收等方面着手,降低企业的协调成本。建议成立全市总部经济推进领导小组,负责推进本市总部经济发展工作,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沟通服务机制,针对优势企业以及总部—制造功能分离的企业所需的各种关键性生产要素予以优先配置,尤其是在财税政策、办公用地(用房)、行业准入、人才引进及降低商务运营成本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以更加优质的服务降低商务成本对企业的影响。同时,上海也应从长三角经济区的发展出发,加强长三角区域总部经济的统筹。上海在总部经济集聚区发展中要主动选择总部经济的高端,避免与浙江、江苏的中心城市形成同质竞争。对于一些与制造部门密切关联的行政型总部、研发型总部,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其落户于周边城市,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长远竞争力,进而推动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与影响力释放。

四是采取开放型、市场化的手段加快上海本土骨干企业的资源整合,促进内资总部经济的发展,为上海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上海总部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培育本土总部企业的成长是当前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基于此,上海有必要出台专门针对内资企业总部发展的政策文件,积极吸引与鼓励各种优势企业入驻,为产业的发展集聚更多的优势资源。同时,为了发展总部经济,在研发、营销和治理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形成中需要

长期的、大规模的投入,因此,上海一方面应加大对当地优势企业的投入,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进本土有潜力的总部企业发展壮大,采取开放型、市场化的方式加快骨干企业的资源整合,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吸收体制外的优势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引进、培育,形成一批品牌优势企业,引领生产要素的集聚,逐步构建成熟的产业链条,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价能力,为总部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上海应加大本土优势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争取更多优质资源,通过对其他地区企业的并购重组,获得总部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对于国内一些大型企业来说,总部迁移也往往意味着企业核心领导层长期居住地的改变,因而迁移目标地除了具备高效的商务环境外,是否具备适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家庭居住的舒适生活环境,以及高水平的教育、医疗资源等,往往是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上海应充分利用中心城区的优质中小学资源以及高水平的医疗资源,以此激发企业高管移居上海的意愿,对企业高管人员及其子女在劳动就业、信贷融资、财务税收、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政策,消除高素质人才的后顾之忧。

五是聚焦产业功能,优化上海总部经济集聚区的建设,增强总部经济的“根植性”。首先要明确发展重心,大力扶植与城市功能以及产业定位相适应的重点总部经济集聚区。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应围绕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以及相对应的产业发展方向,立足全球视野,谋划总部经济集聚区的发展思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许多高端金融活动在上海集聚,需要金融类企业总部的进入,因此,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应该是上海总部经济集聚区发展的重中之重。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高度密集的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包括陆家嘴特别是虹桥商务区在内的上海市中心区域的中央商务区(CBD)构成上海商贸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北外滩则兼具金融类企业总部与航运类企业总部集聚的优势,同时外高桥保税区的跨国公司营运中心也兼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两方面的功能。国际经济中心的建设相对而言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模糊的发展目标,一般认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要同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对外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服务功能,因此,那些能够集聚国际知名企业总部,并且控制管理、研发、营销等高端、核心职能的区域也应该是上海总部经济集聚区发展的重点,这些区域包括上海拥有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一些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地。其次更为重要

的是要增强总部经济的“根植性”,加大总部经济集聚区与所在地产业发展的耦合。上海未来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建设不仅要重视企业总部机构的引进工作,更重要的是加强对现有入驻总部机构的服务,努力打造集聚区的总部文化。一个好的总部经济集聚区要有地方性的产业集聚特点和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只有共同的区域文化造就企业核心的增值,才能造就更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造成企业在一个区域内真正根植。这样的总部经济集聚区不仅能够守住阵地,而且能够不断地做大、做强,成为具有文化凝聚力的总部经济集聚区的典范。

六是抓住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机遇,努力突破制约总部经济发展的瓶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试验区)内在的制度与政策创新为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但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限于总部企业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发挥其对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发展思路上,我们既要做“增量”,也要提升“存量”的效应。一是放大大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应,吸引更多更高质量的总部企业落户上海;二是松绑现有总部企业的束缚,发挥其潜在的能量,增强这些企业的根植性;三是创新合作机制,优化外资总部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对接合作机制,促进本土企业嵌入甚至引领产业价值链,提升上海总部经济的内生机制。具体而言,上海应借力自贸试验区,在以下几方面实现重点突破。首先,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激发总部经济的发展热情。依法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并赋予一定的立法权是国际通行做法。公正透明、体系完备的法制环境是自由贸易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在接轨国际法制环境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自贸试验区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就是要营造公正透明、规范高效的法制环境,为接轨国际规则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为我国下一步开展自由贸易园区立法工作提供试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市场自由化的试验田为企业运营带来便利的同时,企业之间的摩擦也必将会增多,政府监管的防火墙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则是处理上述问题的重要依据。规范、透明的法制环境能减少总部企业的隐性成本,也是吸引总部企业的重要因素。其次,要创新监管模式,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总部企业的协调成本。自贸试验区在行政审批上的改革应主动与总部企业的发展需求相匹配。一方面在企业注册设立上体现便捷性,借鉴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验。在上述两地企业注册程序十分简便,创办企业所需的时间成本非常低。如在中国香

港,企业设立依照公司法规一般只需要3个程序即可注册,且将公司注册与商业登记绑定,商业登记主要以税务为目的,并非针对监管企业的商业活动,企业注册设立后的日常监管则完全依照完整的法律法规执行,不再进行行政性管理。另一方面改善商务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以更加优质的服务降低协调成本对总部企业的影响。完善上述方面就需要在监管模式上进一步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放开必然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容易造成部门间的权责模糊,需要尽快在法律层面上确立自贸试验区内的监管主体,规定具体职责,并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电子口岸、监管系统和行政管理平台的对接,实现多部门综合监管。再一方面要拓展现有“负面清单”的架构,逐步向“负面清单+不符措施”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开放宽松的外资准入制度是自由贸易园区实现“投资自由”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开放度和自由度的重要体现。目前“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成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管理的重要方式。这也为总部企业的设立、投资的扩大提供了一个准绳,划定了界限,应该说透明化是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的。但就降低投资限制、扩大开放领域、营造一个有竞争力的管理模式而言,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清单,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对其作出动态调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保留行业+特别管理措施”,而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代表的贸易投资协定都还包括一项“不符措施”的说明。由于我国大部分产业的竞争力还不高,相关的监管模式还不健全,因而制定一套与“负面清单”相配合的“不符措施”办法尤为重要。同时,应在负面清单的调整过程中,加快建立以动态比较优势为核心,兼顾产业安全、产业损害的负面清单制定指标体系。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竞争力较强的产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鼓励这些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抢占话语权。如鼓励类中限制合资的行业的企业以及限制类中要求有中方控股的企业中有些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因而下一阶段可以考虑进一步开放,真正体现贸易自由化、改革常态化的初衷,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扎根。最后,要以金融创新突破总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增强总部经济发展的活力。国际上成熟的自由贸易园区基本都实行宽松、自由、开放的外汇管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安排,而这些方面恰恰是制约上海总部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在金融

自由化的同时控制汇率的风险、降低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更是关键的难题之一,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内与区外的“双轨制”更是增大了套利的风险。因此,应完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就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进行创新实验,突出其为实体经济、总部企业服务的宗旨,避免为金融而金融。同时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逐步放开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对区域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可先允许办理,然后进行相关审核;区域内的企业在境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可以从境外拿到区域内使用,回流资金可在区域内银行开设一般存款账目;鼓励在区域内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交易、结算平台及各种金融交易平台,同时向境外投资者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在上述框架下实现金融创新为总部企业服务的目标,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效对接。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001
第 2 章	总部经济的基本理论及发展趋势	006
2.1	总部经济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006
2.2	总部经济的形成机理与发展路径	013
2.3	总部经济的效应	015
2.4	总部经济的发展趋势	016
2.5	上海发展总部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020
第 3 章	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趋势及战略	030
3.1	上海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率先步入了“新常态”	030
3.2	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要素分析	039
3.3	上海创新要素分析	054
3.4	上海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058
3.5	基于要素密集度视角的上海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070
第 4 章	总部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关系	092
4.1	总部经济促进城市产业转型的基本逻辑	092
4.2	总部经济的产业分布特征	096
4.3	影响企业总部选址与迁移的因素	103
第 5 章	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现状	110
5.1	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发展的主要特点	110
5.2	上海国内企业总部发展概况	116
5.3	上海总部经济集聚区发展现状	121

5.4	上海总部经济竞争力分析	127
第 6 章	上海总部经济与产业转型对接的现状与问题	142
6.1	上海总部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的效应	143
6.2	上海总部经济与产业转型对接存在的主要问题	152
第 7 章	总部经济与产业转型对接的经验借鉴	157
7.1	纽约:总部经济引领产业升级	157
7.2	新加坡总部经济与产业转型:从“制造基地”到“总部基地”	162
7.3	香港的总部经济:经济结构转型与总部经济耦合的典范	167
第 8 章	上海发展总部经济促进产业转型的对策建议	171
8.1	总体思路	172
8.2	基本原则	172
8.3	发展重点	173
8.4	推进举措与政策建议	175
参考文献		185
附录 1	上海总部经济的政策汇编	191
附录 2	2003—2012 年上海制造业的要素密集度的划分象限图	205
后记		211

第1章

绪论

上海经济在经历长时期的高增长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到了关键的路口。上海的产业发展中土地等资源瓶颈的约束日益突出,整个经济的增速已经率先步入了“新常态”;重点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链聚合能力还相当薄弱,呈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下的“低端化”倾向,即使在一些所谓的高技术行业,其附加值也比较低。同时上海肩负着加快实现“四个中心”、“四个率先”和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战略重任,而且,“转型”亦是上海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这些都对上海产业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上海的资源特点与城市功能决定了上海今后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价值链为导向的产业高端化发展思路,在重点产业与高端价值链环节中加以重点突破,因而发展总部经济无疑是上海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战略途径。从本质上来看,总部经济是城市拥有的特有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在城市的一定区域内集聚而形成高级商务集群,使得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大型中心城市共存共生。国内外经验表明,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和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集聚高端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城市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总部经济具有的集聚经济、高端经济、创新经济、集约经济、合作经济等特征符合中心城市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内在要求,总部经济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所产生与衍生的行业正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产业转型的方向。著名的国际大都市纽约、东京和中国香港地区等无一不是通过发展总部经济来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典范。

近年来,上海总部经济快速发展,总体发展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目前,上海总部经济发展已经迈入“千时代”,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一直以来,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还属于注重数量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数量上的增长并未给上海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推动。现在上海的总部企业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资金运作不在其中,即其中有价值的环节并未在上海。而且,总部经济在引领上海产业的升级上也还未达到最佳状况。上述问题的原因更多地体现在法律、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硬性制约。不论是跨国公司总部还是内资企业总部,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与一般企业的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除了一般的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进出口关税优惠等以外,总部企业在资金流动、投资领域、行政审批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同时,上海的总部经济以跨国公司为主,国内总部企业的发展缓慢,对于国资、民资等国内总部企业,无论是政策措施还是重视程度都有待提高。而且,落户上海的总部企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目前上海的企业总部主要分布在化工、机械、轻工、食品、医药等传统产业(这6个行业的企业总部数量占比在70%左右),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上布局较少,这不仅与总部经济的发展趋势不一致,而且与上海产业转型的方向也不符。特别是上海缺乏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大型本土跨国公司,无法在价值链高端建立对全球高端资源与高端环节的支配能力。基于此,本书紧扣上海的产业发展与转型战略,立足国内外优势企业总部的发展战略转型的需求,从理论与实证等方面分析了上海发展总部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上海发展总部经济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也有着特殊的改革开放背景,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的成立也为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自贸试验区的成立,不仅仅是简单扩大对外开放的问题,其要义在于以“开放红利”实现上海经济的再升级,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而上海试点自由贸易区从很大程度上能促进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吸引国际总部企业落沪,以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引领上海产业的转型升级。自贸试验区在贸易、金融、投资准入等方面的改革将会对高端要素的积聚发挥重要的“虹吸效应”,在理论上有利于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但自贸试验区对上海总部经济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究竟是怎样的,要实现这之间的对接需要突破哪些体制、机制,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其对上海总部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等,都是现阶段亟须厘清的问题。本书也从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诉求出发,讨论了自贸试验区的机制、政策创新对上海总部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从完善对接机制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对于正处于转型驱动发展关键期的上海而言,经济增速率先步入“新常态”也给上海带来了较大的挑战,经济的增长速度换挡至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产业上表现为服务驱动,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的特征初现。从产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呈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难以覆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劳动力的技能结构来看,上海现在的人力资本储量显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完善相应的人才培育、引进政策,扩大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来源,提升人力资本的禀赋。另外,投资驱动上海经济的动力出现了疲态,投资效果有所下降,微观企业投资效益的优势在逐步丧失,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能源与环境对上海产业发展的约束依然较强;尽管上海的创新投入与产出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消化吸收能力的低下导致引进技术的本土化发展较慢,高新技术的自主发展能力还亟须提高。这样的条件显然对于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而言还远远不够。未来的全球城市是基于全球网络广泛交流联系,在全球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中具有战略地位,在全球经济事务的协调与组织中扮演超越国家范围的关键角色,有重大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主要节点城市。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在未来的经济分工越来越细化、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分工体系中,在价值分配集中于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以及向少数全球城市集聚的趋势下,高端研发、制造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以及高端服务业所引领的新产业价值链,则是促进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环境友好、集群竞合、集约发展的动力系统,也是统领城市和区域空间重组的主导力量。这一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多地体现为城市对全球价值链的集聚与扩散功能,而总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上海本土总部经济的发展壮大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实现创新转型的重要微观变量。

同时,总部经济成长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总部企业往往在市场中经历了长时期的开疆扩土、发展壮大,需要经久的沉淀。在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业态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企业特别是总部企业的发展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代表新

技术、新商业模式方向的公司成长为总部企业时呈现出了快速、资源整合力强、产业高度融合、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模块化、网络化和以市场需求变化为基点转变价值链策略等新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做强做大的重要突破口。而在信息发达、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许多靠新型创新模式、新技术、新的资源整合方式发展起来的总部企业的成长周期更短,市场的影响力更大。这也需要我们顺应这一趋势,为这些新的总部企业的快速成长壮大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因此,上海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要在全球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产业体系,需要总部经济这一高端经济形态的支撑,而上海总部经济的能力提升也需要产业的转型升级来引领,可见,总部经济的发展与上海的产业转型升级二者是共融共生的统一体。

为了攀登世界创新高峰与价值链高端,上海产业必须实现产业创新链与价值链的融合发展,掌握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在全球创新链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未来,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被新的技术、智能制造、服务所渗透,而这些对创新的要求都较高,因此,如果不能从单纯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则上海的产业会很难实现升级,在国际上也无法获得较高的竞争位势。但在实践中,价值链和创新链并不存在先后次序的问题,二者一定是共生共荣的。传统上我们认为,价值链往往体现着不同产业环节中的价值分布,而创新链一般是指一项科技成果从创意的产生到研发、产业化的链状结构,主要揭示知识、技术在整个过程中的流动、转化和增值效应,也反映各创新主体在整个过程中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可见,价值链和创新链都有着产业这一共同的载体,均是产业价值实现、产业环节融合发展的体现,也都是要素优化组合、合理配置的过程。价值链升级后的高级形态即是逐步成为具有“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等特征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价值链的资源配置,掌握着创新链的核心环节,对高端资源、创新活动都有着重要的集聚效应与影响力。在集聚跨国公司时,政府通过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往往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扩散效应,特别是在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上,还得打好“市场”这场牌。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减少价值链环节的行政干扰,促

进不同市场的融合,鼓励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提高企业联结新价值网络的能力;二是在培育本土的跨国机构方面,坚持开放型、市场化的原则,让企业利用市场化的力量发展,同时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推进核心企业在创新链、价值链上的整合,直至逐步掌控价值链的主导权,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对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专业化中小企业总部的培育,这不仅有助于完善对全球价值链具有管控功能的生态系统,而且还能发挥迂回的效果,催生具有竞争力与影响的总部企业的诞生,从而促进本土企业由嵌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过渡到引领产业价值链。